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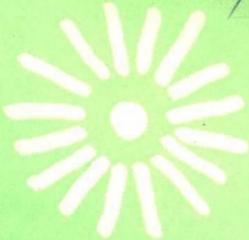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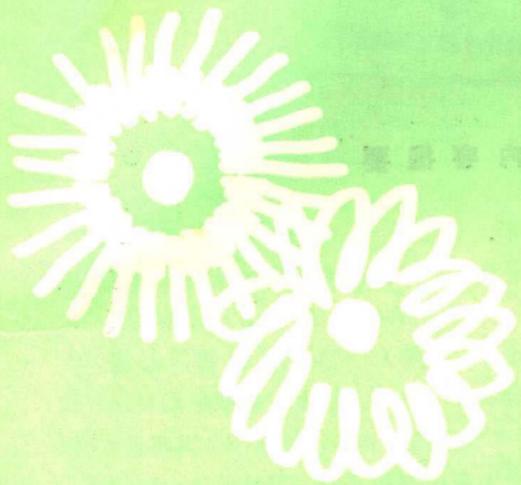


爱情故事

• 薛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44.5
XB
C-1



爱情故事

薛 涛



爱 情 故 事

薛 冰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图书编辑部编辑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京新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625印张 4插页 258千字
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江苏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100册

*

ISBN 7-5059-0875-8/I·611 定价：4.20元

责任编辑：盛国铨 封面设计：潘小庆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东方的爱情故事。

《爱情故事》这个书名是诓人的，这部中短篇小说集里，写男女情爱的篇目不会超过三分之一。《爱情故事》这个书名又是真实的，作者以深沉冷峻的笔触，描绘了近百年来中国人对金钱、土地、事业、自由、爱情、心安神宁的执迷与追求。没有一双眼睛能穿透经验的蒙蔽看清真实的世界，作者不敢许诺为读者奉献出一个真实世界，但他至少尽量客观地去刻画五光十色中各种真真假假的生灵，揭示他们所由产生的历史与文化。他相信人世间丑与恶比善与美更接近真实，所以他用恨来表现爱——这或许能为读者认识世界提供一些新的视点。

序

艾 煉

在青年作家如流星般倏起倏落之际，薛冰这颗新星并不那么耀人眼目，不是那种光焰明亮，一闪而过的彗星。但他沉稳，似乎是从宇宙深处某一星体上崩落的颇有点斤两的一小块矿石。

比起那些二十出头即才华外露的作家，薛冰的起步较晚，三十来岁才从沉睡的文学梦境中醒来，写了第一篇并未引起轰动的小说。但他执著顽强，积数年之力，作品显得沉稳，沉郁，自标一格。

此刻正是文学多姿多彩的时代，作家的招式歧异，路数繁杂。作家们似乎变成了《封神榜》上的人物，各祭法宝，各显神通。有的灵秀、明敏，靠想象的材料，构筑眩人眼目的楼台。有的揣摸透欧美名家的诀窍，拓制出足可乱真的新潮之作。也有的弃巧守拙，缘生活体察或文化积累的老法式行事。河流千条，条条都可通向文学的大海。

薛冰也在此中探索自己的招式路数。

这本集子中的作品，多是以江左江右的民风民俗为背景展开的。写民俗的作品，有的是用异俗奇风装饰作品，以神秘取胜，以猎奇取胜。薛冰是用现代意识观察古老民风，这

使得作品中的人物，特别是一些人物的悲剧命运，更显得深沉。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，如此甚少浮艳、浮躁，更多厚重、沉稳，这是很难能难得的。

作者语言朴实，幽默，运笔流畅。幽默感的表现形态甚多。有浮浅的嘲谑，有俏皮的机智，也有冷面的辛辣，更有纵怀畅笑后的默然沉思。这本集子中似兼而有之。

薛冰是南京人，他对南朝和明清的金陵文化又至为关注，因而其作品自会带有南京地域文化特色。甚至他插队于淮河岸边农村的明祖陵，那里竟也是南京中古文化的延伸。

科技无国界，可以抄袭、模仿，拿来即用。文学，不管是现实主义的或是浪漫的、荒诞的，都是写人的生活。因此，文学不但有民族界隔，甚至有狭窄的地域界隔。民族的、地域的色彩越浓郁，越会融入人类共同的文学仓库中。

薛冰致力于在南京地域文化背景上描绘当代人的生活和命运。这本集子中的大多作品，便是这些尝试的收获。继续探究，也许将会有更深沉更新鲜的成果。

一九八九年五月



目 录

序	艾 煖
本 色	(1)
背 影	(14)
夜色编织的不都是梦	(32)
临街的窗	(48)
黄手帕指导中心	(65)
自来自去几度潮	(82)
八 月	(96)
黑 火	(110)



关铁嘴(148)
半根火柴(164)
爱情故事(177)
走月亮(212)
阎王庙(233)
痴子(244)
无价之错(253)
无价之宝(276)
空白(298)
大学士街1号(327)

本 色

我们的父亲，至多能算个尽职的“本色演员”。

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，公司里的活跃分子，编了个讽刺机关会议特多的独幕剧，叫作《开会忙》。物色演员时，缺个扮副经理的角色。有人怯怯地问了声：“小滕怎么样？”马上遭到一阵毫不掩饰的嗤笑。

“小滕”就是我们的父亲。谁也没料到，这个全建筑公司闻名的“水泥板”，竟会是个热心的戏剧爱好者。他不但逢戏必看，而且心中早已暗暗地怀着一种奢望，想自己也上台尝试一下。所以他一听说自己曾经被提名，下了班就主动赶到排练场。不知是父亲的满腔热情打动了主持人，还是他一米八五的身材和堂堂仪容迷惑了主持人，他破格当了“副经理”。然而雍容大度的“副经理”的台词，经父亲用他那出纳员公事公办的刻板腔调一念，真叫人啼笑皆非。导演伤透了脑筋，才算使他勉强上了路子。直到真的上了台，父亲才明白自己原不是这块料，此番粉墨登场，是大错而特错了。他是除了出纳员，什么角色也演不了的，而且似乎越认

真就越糟糕。方寸一乱，他连手脚往哪儿放也忘掉了。幸而是开会场面，父亲胀红了面孔坐在桌边，双手抱定茶杯，只顾埋头喝茶，轮到他的词，他也不作声。“会议主席”挺机灵，生着法儿给父亲提词：“副经理，对大家刚刚的发言，您有什么高见，随便谈谈嘛！”父亲憋了半天，冒出一句：“我实在想不起来该说什么了。这会、这戏，该散了吧？”博得了台下一片真心诚意的喝彩。

戏没有再演下去，“‘水泥板’上戏台——无话可说”的歇后语却传了下来，而且在往后的年月里发生了不少衍变。逢到父亲用他那缺少抑扬顿挫的噪音引述财务制度时，报不了帐的当事人会不满地说：“你呀——就该让你站戏台！”逢到父亲在政治学习上沉默寡言时，主持人会似笑非笑地说：“这儿又不是戏台子，你好歹说两句嘛！”“史无前例”之初，专案组还专门立案审查过那句“这会、这戏，该散了吧”的话有没有要共产党下台的含意，不过结案倒非常之快——一共只用了十八个月。

二十五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当年和“小滕”同台“开会”的演员中，有的人当真坐上了剧中人物的交椅，然而也有人已经“寿终正寝”。死也好，活也好，机关里的会议照样挡不住地开下去，并且日益丰富多彩。父亲虽然把关于演戏的愿望在心底越埋越深，却也笨拙地学会了在各色各样的会议上逢场作戏地说上那么几句。他喑哑的嗓音就象一把钝锯在吃力地锯着湿木头，中间还不时夹带出“吭吭”的咳嗽声。

父亲变了。生活象条河，河水冲尽了他须发中的色素；生活象座山，山石压弯了他骨骼宽大的肩背；生活象台阶，

让他从出纳员升到了成本会计，生活象十个数码字结构成的车轮，他似乎永远也转不到尽头。概而言之，现在让父亲站到无论怎样眼慧心灵的导演面前，也不会引起人家一丝一毫的心动了。

父亲彻底成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。

然而这时，有人动员父亲“演戏”。

是我和大哥。

星期六晚上，我和大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做父亲的思想工作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希望父亲能去演一出“退休计”。也就是说，向当年同台演戏的“会议主席”、现今分管后勤的公司副经理，明示或者暗示一下，如果这一次的房子再不分给我们家，父亲便要退休了。实在因为世面上通行、流行、盛行、横行的法门，不是父亲绝对不愿办的，就是父亲绝对办不了的。我们山穷水尽，才出此下策。

父亲起先坚守住自己的阵地，一步不肯通融。他翻来覆去用以抵挡我和大哥的唇枪舌箭的，只有两块盾牌：一是他已经递交了申请扩大住房的报告，二是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正在研究新房分配方案。

我们当然知道父亲会写申请报告。父亲决不是不心疼我们。每回我或大哥的女友进了我们家拧眉毛咬嘴唇，父亲伛偻的腰就会弓得更深，而且接连半个月总是带着负疚的神色，说起话来也格外小心地回避“房子”、“儿子”和“妻子”。所以他每一次都用尽心思把申请报告写得格外情词恳切。也只有从报告交上去到房子分干净之间，他的精神才会显得轻松一点。然而不管父亲愿不愿意相信，正是因为缺少恰到好处的“附件”，所有的报告都成了一纸空文。再说职

代会吧，呼声甚高，可惜至今还是“丫环挂钥匙——当家不作主”，比橡皮图章还橡皮图章！父亲太实心眼，他不但不能演戏，甚至不会看戏。他只知道戏台上上演的是戏，却不明白主席台上也常常是在演戏，而且是演得更为成功的大戏。我们用一点小“技巧”搞一间半间房子，实在是无可非议的。

“人家是人家，我们是我们。”父亲坐在大哥的小床边，听着我们鞭辟入里的议论，脸色越来越阴沉，“学坏样倒是容易！”

“你什么都不争，哪个又说过你一声好？”大哥低声咕哝。

“自己心里明白，要哪个说！”

“明白什么？连自家儿子的死活都不管！”我反正逼上梁山了：“我们‘先礼后兵’，你不去争，我跟大哥去抢占一套！”

大哥佯作傲岸地坐着，表示做我的坚强后盾。

父亲干皱脸上昏涩的眼睛，仿佛不认识似地，把我看了又看，终于长叹一口气，脊背高高地耸起来，胸脯贴到了膝盖上。

我们一鼓作气，扩大战果，请父亲立即出马。兵贵神速。事不宜迟。眼下时兴的是“现代化”和“高速度”。谁知道一夜之间，又会变幻几多春梦？再说就凭父亲这份迷糊劲儿，你敢保他明天不变卦！

父亲漠然地张大着双眼，默默地站起来。摸出月票看看，然后便死命地去抻上衣前襟。前襟虽平展了些，却比后襟长出了一寸多。我忙扯住后襟帮他拉齐整，可他一迈步，后襟又固执地缩上去了。看着父亲有些滑稽的背影消逝在街灯

的昏黄光线中，我的心不由地抽紧了。

可是，我们家实在太需要扩大一点住房了！

过去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，什么东西能不发生点变化呢？连父亲办公室里的办公桌，也换过两次了。第一张办公桌，父亲请木匠把桌腿加高了十公分；第二张就没加高，只垫了几个方木块；现在用的第三张，什么也没垫，父亲伏在上面也觉得很合适了。可是我们的住房面积却没有变化，仅仅在房外搭了个三平方米的厨房；房里添了一道屏障，一间成了两间。名为两间，里间除了父母的双人床，床前一摞儿箱子，只剩下门边半平方米的空地，老人们每天上床睡觉就象钻碉堡；外间只容一床一桌，尽管桌子早已从二尺四对方的换成了一尺九对方的，尽管为了不让烟气争夺我们可怜的空间，父亲早已戒了烟，每晚还是要拆掉活动方桌，才能从墙上取下我的折叠床。

那些心安理得地享用着五十平方米的套间，外加厨房、厕所、阳台、卫生间的人，当然是不会理解我们的心情的。只有我们自己才充分体会到父亲此行的重大意义。母亲、大哥和我都在焦虑地等待着父亲归来。但是等的时间越长，我们反而越平心静气了。因为这说明父亲没有扑空，也没有被人家草草支应出来，他们在认真地、深入地、融洽地、甚至推心置腹地讨论我们家的房子问题，这本身就是成功的征兆，这就是希望！

希望又引起了心灵的另一种骚动不安：迫切地要求得到证实。坐在大哥小床边上结毛衣的母亲，越来越频繁地抬眼望房门，虽然没有脚步声、没有风也没有猫。一会儿，邻家的电视节目结束了，热心的观众们叽叽喳喳地从门前走净

了。母亲突然推开毛衣，起身拉开了门，于是我们看见了父亲微微晃动的身子和惨白的脸。灯光照得他不自觉地眯紧了眼睛，急忙举起双手，挡住了灯光，也掩住了带愧色的面容。我的心猛地落进了冰冷的深渊。母亲轻轻扯了下父亲的衣袖，他才沉重地跨进房来，并且一直走到日光灯下。现在灯光照不着他的面孔了。

“该……该写份申请……申请退休……”父亲忽然结结巴巴地说。

谁也没有要求他解释，但是既然他解释了，我们当然也就应该信服。然而谁也说不出一个附和的字眼来。大哥和我俯身在桌上，我眼睛看着面前的书，心里却在拼命揣度父亲出门后这两个小时中发生过的一切，想判断出父亲是在什么时候站到门口的，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。母亲坐回小床边上，使劲地扯着结错了针的毛衣。父亲在桌旁站了片刻，从桌下抽出方凳，安置在门口，倚门而坐。他原来就缺少表情的脸，此刻更显得僵滞了。

房间里静得使我好象听见了各种古怪的声音。我竭力想弄出一点什么声响来，可是我的每一根指头都被这僵冷的气氛冻硬了。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，我怕我们都会变成石像，变成木乃伊。幸亏父亲支着膝盖站了起来，弓腰从小床下抽出张小板凳，放到方凳边，伸手从头顶的搁板上，取下过节才喝的“洋河”，蜷缩在方凳和小板凳之间，颤着手滴滴拉拉地斟上了一蛊酒。一股喷香的酒气冲入咽喉，他干哑地“吭吭”了两声。

听见咳声，母亲抬起了头。她狠狠地盯了我们一眼，似乎想把大哥同我痛骂一顿，但是她的目光在大哥的花白头发

上碰软了，落到我开始起皱的眼角上时，就完全柔和了。她不声不响地站起来，从门缝中挤出去，进了就房搭披的厨房，“噼啪滋啦”，一股葱花香裹着蛋腥味飘进来，母亲为父亲炒了盘鸡蛋。

父亲对着酒菜出神，竹筷在指间不听话地颤抖，他终于把它架牢在碟边。他的脸憋得通红。二十五年前，我四岁，伏在台角看父亲演戏，他的脸就是这样红法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因为我后来再没见过父亲的脸这样红过。我的心乱了，寻求支撑地去望母亲和大哥。

大哥依旧垂眼盯着那长久没有翻动的书页，偶而用左手搔搔花白头发，同时抬起眼皮，眼珠一转，却又什么都没看见。他似乎在自己的五官外修了一道无形的墙。

母亲手中的竹针焊在一起，线团从床上滚下去，停在父亲脚边。她哀伤的目光不断扫过去，终于迎上了父亲的视线。父亲全身一震，端起满满的一蛊酒，往酒瓶里回，可是泼泼洒洒的，都流在手上和地上了。他把酒瓶放回搁板，把鸡蛋盘递给母亲，揩揩沾着酒液的手指，宣布：“睡吧！”待父母上了“岗”，我和大哥才重新“布防”。

熄了灯，屋里更是一片沉寂。父亲虽没沾酒，可是“吭吭”声却震人心弦，辗转反侧，“吱哑”声越响越烦躁。

大哥也没睡着。窗外透进的星光把他的头发全染白了，虽然背着脸，我总觉得看见了他熠熠生光的眼睛。他在想什么呢？也许在考虑，如果父亲的奋斗就此告终，我们会不会真的去强占住房？

我知道我不会。大哥更不会。撬开锁，搬进去，也许不难；但随之而来的争吵，纠缠，打架，或者恳求，乞怜，……

我们全做不出来。我们是父亲的儿子，全部希望只能寄托在父亲身上。

我已经二十九了，大哥比我还大三岁。小时候大哥、二姐和我捉迷藏，我觉得这房子好大呀，我怎样也找不到他们。一转眼我们都长得人高马大，本来我们的孩子也该会捉迷藏了，然而连大哥还在“称孤道寡”呢。他那位在“广阔天地”共过患难的多年女友终于走了。我们全家都没有一言一语怨怪她：她总不能贴在墙壁上呀！

父亲一定也想到了这些，他咳得更起劲了。

我们目前唯一而又极其渺茫的希望，就只能寄予在父亲单位正分配着的一百二十套新房上。大哥的单位是“大集体”，建厂以来没盖过住房，我们单位呢，至少也得等三年五载。父亲呢，论条件他早该分到房子的，可就象加工资一样，每次人家都动员他“等等下班车”，而他也总是应承下来。他相信领导上的安排一定有着他参不透的道理，“几千号人的单位，当这个家不易！”至于“上了车”的人呢，当然会比他有更充足的理由，不然谁会昧了良心，来欺侮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们呢！母亲偶或嘀咕两句，父亲马上就正色道：“你这是对谁呢！？有这样的日子过，还不知足呀？国家多会亏负了我们？”随后便列举起他在财务会议上听来的一串串枯燥到极点的数字，母亲只好缴械。每次加完了工资或分完了房子，父亲总要说一句：“我这辈子什么也不强求，只想清清白白做一世人。”照例赢得几句只有他自己才会满足的廉价的恭维。

父亲就是这样的人。几十年来，他象块“水泥板”一样毫不走形，毫无弹性地恪守着一切规章、守则、定例，社会

的变化和风气的污染似乎同他全不相关，他决然想不到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希望变成现实。我们比父亲现实得多。我同大哥详尽地研究了建筑公司的形势，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事实：虽然父亲的学生遍布全公司，但他身边只有一、二年的新手，如果父亲提出退休，财务处长非挽留不可，而那位挺机灵的“会议主席”副经理当然会恰到好处地转圜僵局，况且公司里比我们更困难的决没有一百二十户。我们满以为能够理直气壮地用七分说服加三分强迫，战胜父亲不合时宜的迂阔，唤醒他的亲子之爱，可是现在……

大哥将我推醒时，天已经大亮了。父亲正在“碉堡”口上往外探头。我赶紧翻身下地，把床铺挂上墙，让出走道。父亲忙忙地支起桌子，就伏上去写起来。我偷眼去看，横格纸上规规矩矩地写着“申请退休”四个大字。父亲的积极态度，让我们比较地放心了。我怕打断他的思路，便拉大哥退在一边。可望着父亲围上黑圈的眼窝，更显出浑浊的眼球，又不由有些心酸。小时候，公司的办公楼是两层，我溜进财务科，总是神采奕奕的父亲第一个看见我，他坐着比谁都高。我悄悄站在门边，看父亲左手打算盘，右手记帐，嘴里偶或轻声漏出一个我怎么也数不出的大数字。父亲的算盘打得极好，不但“噼里啪啦”响得清脆悦耳，而且准确迅速，在全公司业务比武中，赢过人家的计算机。如今，公司的办公大楼已经翻盖成七层，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我们家的阳光，我因事到财务处去找父亲，他就象此刻这样咳着写着，耸起的肩背不住乱颤。听见响到桌边的脚步声，总要先把桌上的帐据理理顺当，压在手边，然后摘下老花镜，抬起头，眨巴着眼，好一会儿才能认出我来。可是他打起算盘来还是那样